

https://farid.ps/articles/when_law_fails_family_fear_and_the_roots_of_oct_7/zh.html

当法律失效时：家庭、恐惧与10月7日的根源

截至2025年7月9日，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是国家豁免和国际瘫痪后果的严峻见证。在这种责任真空中，绝望的行为应运而生——这些行为不仅受到意识形态的驱动，更受到保护家庭的原始本能的推动。以色列广泛使用的行政拘留，以记录在案的酷刑和儿童虐待为特征，继续直接违反国际法。然而，国际社会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它。本文认为，2023年10月7日的绑架事件——当时251人被带到加沙——并非随机暴行，而是系统性不公的必然结果。这些事件源于一种心理和政治现实，在这种现实中，法律无法提供保护，绝望成为了一种武器。

尽管这些非法行为不被认可，但理解其根源需要审视完整的背景：一个旨在压迫的法律体系、不愿干预的国际社会，以及由大规模拘留和虐待触发的普遍的父母本能。如1997年电影《执行目标》中所戏剧化表现的那样，一个男人为了救妻子被迫参与恐怖阴谋，对亲人的威胁超越了常规道德。当制度正义失效时，这种本能既是解释，也是警告。

以色列的法律违规：作为集体惩罚的拘留

几十年来，以色列一直维持着行政拘留制度，允许在没有指控或审判的情况下，通常基于秘密证据，无限期拘押巴勒斯坦人。这些自1967年以来实施的做法，明显违反了《第四日内瓦公约》（第64-66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和第14条）。

截至2024年中，超过9500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拘押，自2023年10月以来，至少有53人在拘留期间死亡——据国际特赦组织称，许多与酷刑有关。年仅14岁的儿童遭受了性羞辱、殴打和心理虐待。这些不是孤立的过激行为；它们是一个将拘留武器化针对整个人口的系统性机制的特征。

这种胁迫、镇压和控制的策略类似于1979年《国际反劫持人质公约》中定义的劫持人质。在军事法庭中99.7%的定罪率使得法律救济成为虚构。在这种情况下，巴勒斯坦家庭不仅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反而受到法律的迫害。法律框架本身已成为一种支配机制，呼应了历史上国家法律被用来为暴行辩护直到被外部力量挑战的实例。

国际共谋：保护失败

尽管有来自联合国机构、人权组织和国际观察员的广泛记录，世界未能采取行动。没有采取有意义的制裁、国际起诉或外交措施来追究以色列对其拘留制度的责任。2005年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确认的《保护责任》（R2P）要求国际社会在国家无法防止反人类罪时进行干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执行措施完全缺失。

2023年至2025年间通过停火调解的囚犯交换——特别是释放135名被拘留者——表明政治意愿可以改变结果。但这些时刻是冷漠常态的罕见例外。正如2025年联合国大会辩论中所重申的，世界未能履行其维护R2P的职责。与此同时，国际刑事法院（ICC）的缓慢调查未能产生可执行的行动。巴勒斯坦人仍然被困在惩罚性的占领力量和视而不见的国际社会之间。

这种沉默使虐待成为可能。它让人想起国际社会过去的失败——从卢旺达到波斯尼亚——那里法律规范是明确的，但执行意愿缺失。像那些悲剧一样，以色列拘留制度所获得的豁免要求清算。

保护的本能：无法无天的系统与心理触发

当法律崩溃时，本能接管。保护子女的冲动是人类最强大的本能之一，由进化根植。2024年发表在《自然评论心理学》(Nature Reviews Psychology)上的研究表明，父母投资在生物学上与跨物种的生存策略相关。对子女的威胁会引发深刻的神经反应——恐惧、攻击性、绝望——特别是当这些威胁持续且无法解决时。

2023年《创伤压力杂志》(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的一项研究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联系，揭示了集体创伤和无助如何放大反应性攻击。HubPages文章“本能——我们是否天生具有保护本能？”(2024年更新)将其比作“母熊”反应，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当亲人面临危险时，会超越社会和法律规范。

这种现实在1997年的《执行目标》中被戏剧化表现，一名特技司机在妻子被劫持为人质后被迫参与绑架阴谋。对家庭成员的威胁迫使他采取他原本永远不会考虑的行动。这一叙事虽然是虚构的，但反映了许多巴勒斯坦家庭的现实。超过9500人——包括儿童——被拘留，巴勒斯坦社区生活在持续的丧失、虐待和死亡恐惧之中。

在这样的环境中，报复、用人质交换人质的冲动不仅合理，而且不可避免。2011年的囚犯交换——1027名巴勒斯坦人换取一名以色列俘虏——表明非法压力会产生结果。在缺乏正义的情况下，绝望成为策略。2023年10月7日必须在此背景下理解：一个由系统性拘留、国际遗弃和保护亲人的压倒性本能塑造的绝望行为。

选择性愤怒的虚伪

在不面对引发非法反应的虐待的情况下谴责这些反应不仅是虚伪的——而且是危险的。它维持了一种道德双重标准，即国家暴力是合法且不可见的，而反应性暴力是犯罪且被谴责的。这种不平衡侵蚀了国际法本身的合法性。

逻辑很简单：如果负责维护正义的机构失败，人们会寻找其他手段。正如《执行目标》的主人公在无人拯救他妻子时选择非法行动一样，当他们的家庭成为目标且没有救济途径时，受压迫的社区也会采取行动。这不是辩解——这是原因的诊断。

历史告诉我们，真正的责任针对的是系统，而不是症状。纽伦堡审判并未从责怪绝望的德国公民开始；它们拆除了豁免结构。要结束巴勒斯坦的暴力循环，国际社会必须直面根源：以色列的系统性违规及其军事法律机制。

结论：结束虐待，否则期待绝望

以色列的行政拘留制度，建立在法律借口之上并通过暴力维持，代表了对国际法的严重违反。全球社会持续未能执行其自身的人权标准——通过R2P或ICC授权——创造了一个真空，在那里保护家庭的本能成为一种政治武器。

10月7日并非不可避免，但它是可预测的。当法律体系崩溃时，最古老的本能依然存在。与其谴责绝望者而保护强者，世界必须直面这一冲突核心的结构性不公。

结束以色列的拘留制度、执行国际责任和恢复对法律的信任不仅是法律上的必要条件——它们是防止未来绝望的唯一途径。在这实现之前，豁免和反应性暴力的循环将继续，由恐惧、创伤和保护最重要事物的持久本能驱动。